民國叢書

第二編

·78·

歷史·地理類

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何幹之著

中國啟蒙運動史　何幹之著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何幹之著

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　何幹之著

上海書店

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何幹之著

序論

開宗明義第一句，應說明本書要說些什麼。本書既然題名為「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對「過去」「現在」和「未來」就應有一個界限。「現在」一語，包括着目前一切社會現象，我不能夠對一切現象都說到，所要說的是經濟現象和政治現象，即是：中國民族經濟發展的傾向，帝國主義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中國資本主義的水準，農業生產的狀態等等，也即是一般人所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這結論當然引起政治問題。在外受帝國主義進攻，內受封建勢力束縛的中國，發生什麼人與人的政治關係呢？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夾擊下，國民經濟一定一天天衰微，不振，沒落，要爭取民族產業的自由發展，自然歸結

到反帝反封建上面來。在歐洲，反封建運動，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在殖民地，再加上反帝的任務。本質上，反帝反封建雖然不會改變了民主革命的性質，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並非千篇一律地把過去的革命形式，反覆一遍，不，它有時代的新內容。新內容是什麼？歐美各國，民主革命是市民階層領導完成，在中國完成革命任務的不是市民階層而是千千萬萬的工人農民。這革命担當者的不同，對革命的轉變，有什麼意義呢？滿洲事變以來，使中華民族陷入於亡國滅種的境地，使全國民衆都團結在抗敵反漢奸的旗幟下。反帝反封建與抗敵反漢奸有沒有聯系呢？這些複雜的經濟政治現象，這本小書要加以概括的分析。自然三五萬字決不能把問題說得明明白白，不僅三五萬字，卽使一冊幾十萬言的專書，怕也說不透澈，我要說的只限於最基本的最一般的提要。

「過去」問題，是很費筆墨的。中國有史以來，不下五六千年，史前更不知道有多少年月。科學的中國史，至今還沒出現，一說到久遠的事情，使人不禁有暗中摸索的感慨。慢說史前的社會，因爲考古學不發達，史料沒有整理，通史多不正確，一提起來：簡直如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卽使退一大步，五六千年中所包括的幾十個朝代，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究竟屬於什麼階段呢？至今也還成爲一個謎。中國社會史，雖然經過過去幾年的爭論，在方法論上漸漸有了眉目，但千千萬萬人所需要的歷史讀本，依然沒有。盤古，有巢，伏犧，燧人，神農，有熊等開天闢地的事蹟，是非常荒唐怪誕，只當作中國史前期的象徵，也許有存在的價値。堯舜禹究竟有沒有這樣的人物？他們的傳說在歷史上應屬於什麼階段？殷虛的古物證明史記殷本紀是可靠的紀錄，如果容許用作推論，夏本紀也許是

信史。但夏殷是什麼社會？周秦以後又是什麼社會？依我個人讀史的意見，我以爲夏以前是原始共產制，夏殷是奴隸制，周秦以後是封建制。這書當然不能包括上下幾十萬年的歷史。這裏原始制的歷史不能說，奴隸制史也不能說，要說的只限於封建制。由周以至清末的歷史，不下二三千年，那幾千年中，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着，朝代變更了幾十次，但社會結構，却始終一樣，動也不動一下。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曾說過：

「爲什麼中國社會始終停滯着？人家還生活於野蠻時代，中國早已產生燦爛的封建文化，如今人家過着資本主義文明，我們還死抱着舊世界，還在亞細亞大平原上，唱東方文明的老調。」

這的確是一個謎。雖然以農奴的剩餘勞動爲剝削對象的封建社會，不會一下子發展起來，一下子可以過渡到另一個更高級的社會。例如西歐封

這過程可以說是原始共產制的滅亡過程，也可以說是奴隸制的生長過程。

在世界史上，這轉變是向着兩個方向發展的：第一是正常的方向，如希臘羅馬型，第二是非正常的方向，如東洋型（中國日本屬於這一型）。什麽是希臘羅馬型？什麽是中國日本型呢？在原始社會的末期（氏族社會），已有了不平等的現象：（1）從那時起，一個人的生產，不只可以供給個人的需要，還有剩餘的生產，人類已開始有剩餘生產的積蓄；也從那時起，由戰爭捉來的俘虜，不再乾脆地殺掉了事，而强迫他們做苦工，當奴隸；（2）在社會內，因爲交換和私有財產的發生，形成了窮富不等的人，後來窮人必墮入於奴隸的隊伍中。這是說，在原始社會的發展行程中，奴主和奴隸的產生，乃不可避免。那是純粹的正常的過程，古代希臘羅馬走的正是這一條路子。東洋各國，雖然農村公社也同樣向着奴隸制而崩潰，但具體的

過程，並非那麼單純，樸素，呆板。那裏，公社內有了階級的分化，同時又征服了其他公社，於是內因和外因起着交互的作用，造成了東洋社會所特有的現象。當然東洋社會的發展，不會改變了歷史的一般法則，可是只咬着一個公式來讀歷史，必定看不見東洋史的特殊性。在古代的東洋，征服者並非要改變被征服者的社會制度，而只憑着武力征服了他們，强迫他們進貢土產（如伊洛魁人對他們的被征服者，印卡人對瓦虬阿人）。在進貢制之下，被征服者的政制，仍原封擱着不動，被征服者公社的內政，不受干涉，他們可以獨自生活在小天地之內。

在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卡爾致恩格斯的信內，曾指出東洋的歷史，是宗教的歷史。爲什麼？因爲在進貢制之下，朝代的交替，就是征服種族的交替。從前他們强壓異族崇拜自己的宗教，如今他們沒落了，再沒有人尊

理論本身的發展，也有辯證法的關係。

中國往何處去呢？

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目錄

第一章　農村公社與封建經濟的停滯

一　爲什麽農村公社殘留於封建時代

凡是忠實於科學的歷史觀的人，都承認由原始共產制而封建制，再而資本主義制，乃歷史的普遍法則，中外古今都沒有例外。但在同一派的史觀中，各人對中國朝代的分期，卽什麽朝代屬於什麽歷史階段，至今還沒有統一的見解。關於前資本主義中的原始共產制和奴隸制，因爲不關涉於本書的範圍，不必加以檢討，封建時代的西周問題，見解不一致。在中國新興史學的文獻中，最初主張西周奴隸制的乃是郭沫若先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在蘇聯和日本的史家中，與郭先生抱同一見解的有奥士博夫

（中國古代史上的奴隸制問題）和早川二郎（古代社會論）。這裏我不想來討論西周非封建說的是非曲直，我只覺得他們所根據西周非封建的史料，來推翻西周封建說是不夠的。但撇開這點不談，只要史家不受「商業資本主義」「專制主義」等現象所迷惑，對中國封建制的停滯，並沒有對立的見解。

接着，新的問題來了。封建制爲什麼停滯着呢？對這問題，我曾經和鄧雲特先生發生過一次爭論，雖然爭論的人，只有我們兩個，而且原則上的爭論，似乎可以收束。各人既執着自己的所見不肯放棄，也只有各自找尋可靠的史料來確證自己的見解。我們在原則上爭論過什麼呢？第一，我以爲「公社的反覆再生產，是緊緊地統一着手工業和農業，加強了農村的孤立性」，因爲工業與農業不分離，農村孤立地存在着，「於是乎中國封

建制於悠悠的幾千年中，在亞細亞沃野上，長期停滯着，翻來覆去，也沒有根本的改變」。我想，這是中國社會停滯的基本因子。第二，我以爲「專制主義統制和包辦手工業，取締和壓迫手工業」，「使手工業的發展，不能動搖他們的支配源泉——地租」，是中國社會停滯的第二個因子。鄧先生反對我的主張，他把「生產力的低下，交換關係的微薄，市場的缺乏」那種種「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的現象，當作停滯的有力基礎；他又以爲說專制主義干涉經濟，是「未免」把專制國家，當作「神靈」，當作「怪物」。對鄧先生第一點意見，我指出這只是農村公社的「現象形態」，我說他顛倒了主客的關係，倒果爲因；對第二點意見，我指出集權國家干涉經濟，乃是科學的歷史觀的「根本概念」，上層結構的本來任務，這在古今中外，都完全一致。

這次爭論，在目前也許不能夠引起多數人的注意，而只限於研究歷史的人的課題，但我覺得終久應該作爲一種史學的常識，使人人也了解。我又覺得提出：(1)農村公社殘留於封建時代所發生的作用，和(2)專制主義包辦或干涉手工業，對生產力的影響，是中國社會久滯的決定因子，也許未曾說得透透澈澈，可是，它的重要性，是不能加以絲毫忽視。

公社殘留於封建社會裏，發生什麽作用呢？那是探討中國社會的核心。在未評價這核心之前，我以爲先來考察(1)公社爲什麽殘留於中國封建社會？(2)在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公社的殘餘形態？再來分析公社對封建經濟的影響，那是非常必要的。那麽——

公社爲什麽殘留於封建時代呢？

讓我說點古代史的事情，從無階級社會進入階級社會的過程說起吧！

建制，由五世紀到十五世紀，俄國封建制，由九世紀至十九世紀，足足經歷了一千多年，然後發生資本主義制度。中國封建制，不只一千年，也不只二千年，乃是三千多年。在這悠悠的歲月中，才準備了特種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同時再添加了帝國主義的外鑠作用，然後發生大機器的工廠工業。這種奇異的現象，的確值得研究歷史的人仔細考察的。它不知道迷惑了多少人。一般戴上近視眼鏡的史家，不用說不了解，即使「獨具隻眼」，爲歷史研究作了劃時代的貢獻的馬恩列三人，也因爲缺乏可靠的史料和缺乏有價値的著作，他們遺留給我們的，只是一些天才的提示，具體的問題，還等待着我們後來者的集體創作。

歷史是有機地連貫着，「現在」由「過去」而來，「現在」又產生「未來」，「過去」的曾當過「現在」，「現在」的又可變成「過去」，「未來」

的也終有「現在」和「過去」的一日。總之，「過去」「現在」和「未來」，乃絕對分不開。要知道「未來」，先要知道「現在」，不知道「過去」，也不知道「現在」。譬如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先要有資本主義前提（內因），同時帝國主義的外鑠（外因），也非常要緊，因爲內因並非常態，外因又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所以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同時也註定了半殖民地的命運，註定了中國民衆要負起反帝封建這二重任務。社會停滯和現階段中國經濟政治有怎樣的有機聯系，難道不明白嗎？

「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就是要解答中國社會的來龍去脈。這是新開墾的田野，我個人的能力，又不能担當這種艱鉅的墾荒工作，不過我是膺服嘗試的精神，人家嘗試失敗了，我不妨再嘗試一次，失敗的嘗試可以做未來的敎訓，卽使我的嘗試依然是失敗了，仍不失有參考的價值。因爲

敬他們的宗敎了。所以後世人往往忘掉了征服種族的交替，而只記着各種宗敎的歷史。卡爾又指出希臘羅馬的藝術是正常，而東洋的藝術却非常奇特。爲什麼？在進貢制之下，征服者的城市，由四鄰搜括了許多進貢品，因此，雖然當時的生產力極低，也能夠集中許多剩餘勞動，使藝術發揚光大；東洋的藝術，徒然以龐大的形式，誇耀於後世，就是爲了這緣故。希臘羅馬的藝術，建築在奴隸勞動之上，與當時的生產水準，並沒有什麼不調和。

中國史有沒有出現過進貢制時代呢？在尙書的禹貢上就記載着進貢的故事。禹貢是靠不住的史料，因爲殷虛出土的甲骨文，明明指證文字在殷末還在形成過程中，所以殷前社會，除了口傳以外，可說沒有歷史。但口傳有一定的限度，由周初追溯到夏初，不下一千多年，當時所傳夏代事

蹟，當然不全可靠。但禹貢所傳的進貢 又不會全是僞造，多少還有點眞實性。夏代貢物的種類有穀類和工藝品。貢獻的東西，沒有註明貢獻的人，只註明貢獻的地方。這是值得注意，因爲這暗示夏族是一征服者公社，強迫鄰近的被征服公社，進獻土產。殷代的四鄰，據甲骨文記載有呂方、土方、羌方、人方、井方、龔方、馬方、羊方、洗方、苜方、林方、盂方、莘邶、二封方、三封方、下勺、鄘、奄宙等被征服種族，他們的生產水準，遠在殷人之後。生產水準不齊一，有什麼關係呢？這問題，日本奴隸制度史給我們一極好的暗示。西日本在一世紀時，已入鐵器時代，但東北一帶，到十一世紀，還在石器時代。因爲生產水準不均等，全國公社的分解也不均等；東北方的蝦夷人是供給西方以奴隸勞動的主要源泉，但爲了他們停留在低級生產水準，奴主用不着他們作農業工業上的生產奴隸。原來奴隸制分解着公社 如今因公社的留

存反而阻礙着奴隸制的進展。如果這例子可以移植來解釋殷代奴隸制的話，那麼，在進貢制之下，殷代奴隸制是不完全的。

地理上的條件，也不可忽視。希臘在地中海的中心，四通八達。這地理上的優越地位，是促進商業關係的有力因子。商業的擴大又加强工業的生產，推廣了奴隸的使用範圍。蘇聯史家科瓦列夫說得好：「……希臘因爲具着有利的地理條件，商業開始猛烈地發達起來。於是商品的需要增加，擴大了生產，使人們不僅用奴隸勞動於家內經濟，并强制他們在手工作坊內製造商品」（古代社會論五頁）。中國沒有這樣的有利條件，尤其殷代是這樣。

總之，中國奴隸制是變態的制度。公社未全被清算，奴隸制未完全成熟，就由這一個歷史階段轉移到別個階段，使公社殘留於周以後的封建時

代。中國封建制的特殊性，正是公社殘留着的緣故。我說：

「我認定如果夏代是歷史上的朝代，一定是征服者公社，那時代已有奴隸的萌芽，大抵是家長奴隸制的濫觴。商代是奴隸社會，雖然因無進貢制的存在和缺少有利的地理條件，商品經濟不發達，奴隸制不成熟，變成了所謂中國型奴隸制，別於希臘羅馬型。然而，奴隸制度在當時，是支配的生產方法，所以殷代是奴隸社會。周繼殷而興，改奴隸制爲封建制，是社會上的一大變革。可是，殷代不曾普遍用奴隸勞動，公社不曾全被清算，就改變爲別種社會，因此，公社也殘留在周以後的封建時代」

二　在歷史上來觀察公社殘餘

日本橫川次郎在西洋人日本人研究中國史的文獻中，發見近代中國農

村中還有不少氏族村落或一村一族村落的存在，發見中國過去有農村公社的發源地——家族公社的記載，發見中國今日有農村公社的痕跡——散圍制的存在。

先從氏族村落說起吧。馬扎爾說廣東一省，氏族的所有地，居全省耕種面積的三〇——四〇%，南方各省，氏族所有的土地，也居重要的地位。英人約翰斯東（Johnstone）說村落制在中國，是一普遍的現象。這些村落，必有一個祖廟，一切祭祀以至村內生活，都在祖廟裏討論和執行。村內的長老是公選，沒有一定的數目。有什麽問題，召集耆老會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出席發表意見。大家族的家長爲村長，對外，他代表村民，對內，他有裁判的大權。村落的公有地，出租於村中的貧家。出賣土地必須徵求村民多數的同意，賣得的錢，或再買新地，或平均分配於村

民。土地的收益，或用爲祭祀費，或用爲村內行政費。還有共同的牧場，公共的坟場，也舉辦救濟事業，援助村中無告的貧人。村民的對外精神，非常勇敢，並且非常一致。

這是一村一族公社的情景。除此以外，還有普通的村落，混雜了各姓的居民。各姓有自己的祠廟，全村有一個祠堂。祠堂是宗教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與別村締結條約，處理村民一切糾紛，以至開學校，辦警政，築道路等事務，都由祠堂主持。村內分若干行政區。祠堂的主事人，由各區分派，一年更換一次，只有二三高級人員，任期較久，並須得政府的承認。其他一切公衆生活，與一姓村落制，沒有多大的差別。

家族公社，載在中國古籍上。橫川說它爲村落公社的發源地。這等家族，普通三四世同居共炊，也有十九世同居的（宋史）。全族人員，普通

有二百人，三百人，七百人，也有四千人。家族內一切不動產全屬於公家，只有賜田和口分田，個人才有處分權。祭祀和家政，並非集中於一身，前者由長子承繼，後者由公衆選出有能者充任。家長有極大的權力，家丁有時也可以發言。婦人的地位，不算極低。關於生產的紀錄，很少很少，大概是採用土地分耕制。家內奴隸，極不發達。族內分家，必須得家丁的同意，分家不久又再合居的，也不少見。五代同居，稱爲「義門」，大抵是官府的懷柔政策吧！

散圖制（Strip System）或混淆地制，就是分耕地爲數區，平均分配於農民的一種分配制度。卡爾當它爲「死滅了的農村公社」的遺蹟。美人波克（J. Lossing Buck）於一九二一——二五年，調查過皖冀豫晉浙蘇閩七省的十五處地方，發見了散圖制是一很普通的制度。中國經濟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的作者李(Lee)以至瓦格納(Wagner)，史密斯(Smith)，韋伯(Weber)等，也都有同一的主張。爲什麼中國有分散制的現象呢？波克舉出三種理由：（1）在於防止少數人得好地，多數人反得劣地；(2)分輕蝗害水災的損失；(3)灌漑在中國有極大的意義，如果耕地劃一，同時又培植同類農產，灌漑可以共同負責。橫川不同意這位美國教授的見解。他以爲研究散圃制，必要追尋這種原始的土地分配制的來歷，指出中國歷史上曾有公社制度的存在。德人瓦格納(W. Wagner)又以承繼法來說明它的來源。他肯定中國不行長子承繼法而行兄弟分繼法，乃是土地分散制的來源。橫川又指出分散制是一種歐亞共有的制度，所以承繼法不能夠說明它。市民學者在暗地裏摸索着。散圃制不是別的，乃是「死滅了的農村公社」的遺蹟。

我這樣不厭煩瑣，轉引那許多史實，爲的是要證明農村公社在中國社會長期殘留着。馬扎爾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初版，一九二八年出版於莫斯科，他的材料，搜集於一九二五——二七年。約翰斯東的華北的獅與龍（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一九一〇年出版於倫敦，他所研究的對象，是近代山東威海衞。關於農村公社的研究，還有日人山田秀二的「明清時代的村落自治」等。他們所研究的時代，是近一百年，頂遠也不出明清二代。可知公社制度，一直保留至今日，可知中國過去有孤立的自成小天地的村落公社的存在。家族公社的記載，大多出自漢唐宋明清等朝代的文獻。波克的農村調查，在一九二二至二五年舉行；他的大作中國農家經濟（The Chinese Farm Economic）初版一九三〇年在南京出版。

總而言之，一直至近百年還存在着的村落公社，中國古籍上記載着作

爲村落公社的發源地——家族公社，和農村公社的痕跡——散圃制，是農村公社長年永月地遺留的鐵證。剩下的問題是：農村公社在中國史上，有什麼意義？

三　公社對封建經濟發生什麼作用

在今日，雖然氏族的公有地，村落機關，早已變爲壓搾農民的主要手段，管理土地，主持村中一切公共機關的，乃是土豪劣紳。他們同地主，商人，高利貸，互通款曲，壟斷了鄉村的一切，變成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支配階層。蘇聯少壯學者瓦林(M. Volin)和約克(E. Yolk)二人，曾調查過廣東農村，發見省內三千五百乃至四千萬畝耕地面積中，租田，學田，屯田，廟產佔一千萬乃至一千三百萬畝(約三〇%)。這廣大的土地實際

上早已變了土豪劣紳的私有財產。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公地的實際所有者。但有一件事要注意：這公社殘餘不但「緊緊地統一着手工業和農業，加强了農村的孤立性」，而且證明了在過去的封建時代，有不少自成小天地的村落公社屹然孤立着。

爲什麼農村公社的殘餘可以束縛着封建經濟，使它久滯於小天地內，好像孫行者打筋斛，打來來去，也打不出如來的手掌心呢？

我曾說過：

「在公社中，農業和家庭工業打成了一片，經濟生活是自給自足，各個公社，都閉關自守，不聞不問。用一句古老話說：鷄鳴犬吠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又說：

「公社的生產，低得可憐，只有些少的剩餘生產，也沒有交通機關，有了，

大家也用不着，因爲交換是偶然的現象，各個農民，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一個個隔離着。自掃門前雪的人，自然也管不了他人的瓦上霜了，所以他們只有地理上的關係，而沒有經濟上的聯系。」

我相信這幾句話可以相當地表達出公社的情景。農業和工業既然密切地聯系着，你離不了我，我也離不了你．農民是手工業者，手工業者又是農民，那麼，他們的一切日常用品，由每天開門的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以至耕田用的犁，耙，鋤，鍬，或作工用的鉋，鋸，鑽，鑿，一概可以各自生產，供給自己的需要。在這生產狀態下，老死不相往來，也一定是應有的文章。並且生產始終要維持着自足的狀態，生產的目的，只不過滿足極單純的生活。爲了缺乏生產的刺激，生產力必然如龜步在爬行，或停留於同一的水準上。沒有經常的交換，有的，也只限

於偶然。沒有商品的交換，也用不着交通機關。大家如果隔離着，只有地理關係而沒有經濟關係，道路豈不是多餘的贅物嗎？卡爾說得好：「村落的孤立，影響到道路的閉塞，道路的閉塞，如今又反轉來加强農村的孤立了」。試問在這自滿自足的小世界裏，那裏有經常的商品交換現象？既然交換不是經常的現象，生產力那裏有長足的發展？城鄉的分化，那裏能夠順暢地進行？中國封建制在悠悠三千年中，依樣葫蘆而不改古態的，就是農村公社在那裏兜圈子的緣故。恩格斯說：

「在古香古色的公社殘留着的地方，是幾千年來最樸素的國家形態，即東洋專制政府，（由印度以至俄羅斯）的基礎，只有這公社崩潰以後，各民族才脫出舊的圈套，飛躍地進步起來」（反杜林論，引自古代社會史一二九頁）

卡爾說：

「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絕地反覆再生產，忽而破壞了，又忽而原樣地出現於同一的場所。這種單純的公社組織，與東洋各國不絕的興亡，循環不已的改朝，剛作了一個對照，對東洋社會爲什麼久滯的祕密，提供一把解決的鎖鑰。社會經濟的根本要素，始終不曾受到政治風雲的襲來所影響」(資本論第一卷，轉引自古代社會史一二九——一三〇頁)。

這兩段古典的文獻，對於描寫公社的情況，描寫公社對封建經濟的阻滯作用，是再明顯也沒有了。馬恩二人所指出的總是東洋社會，恩格斯還特地舉出印度和俄國，但中國歷史也如同一轍，那是沒有疑問的天經地義。由周秦漢三國晉隋唐宋元明清，朝代的興亡，不下二三十次，但政治風雲的襲來，改朝易主的革命，是犯不着封建的經濟結構。不論劉邦滅秦，司馬昭滅漢，抑或楊堅滅晉，李淵滅隋，趙匡胤滅唐，成吉思汗滅

宋，或朱元璋滅元，朝代的改變，可說千變萬化，但中國仍是一個封建社會。清末，西方的傳教士，商品和槍砲東來之後，中國社會才來了顛倒乾坤的大變。傳教士左手執着聖經，向東方宣傳基督，鼓吹迷信，右手又挾着五光十色價廉物美的商品。可是，等到中國人要起來反抗文化的侵略，反對教士的橫行，等到洋貨泛濫於珠江揚子江黃河三大流域，淹沒了中國農村，迫着農民由死裏逃生，起來反抗經濟侵略的時候，他們就拿起犀利的武器，向手無寸鐵的農民，殺得寸草不留。從那時起，中國農村起着急激的變化。同一時期內，資本主義的機械生產，也流入於東方的古國，半殖民地中國也在資本主義東來的過程中形成了。關着門不問不問外事的公社，受了這一致命的打擊，已不復再能屹然稱孤道寡。如今中國窮鄉僻壤的農產品，通通與紐約倫敦柏林巴黎東京結了不解緣，資本主義的商品，

也佈滿於三家村。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根本已過去了。當然因爲半殖民地國家有外敵和內奸的夾攻，生產力不能夠前進，可是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已起了劇烈變化，中國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了。馬恩的話，我以爲該這樣解釋的。

四　貨幣地租不是普遍的形式

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有農業和工業的兩個範疇。農業關係是地主對農民的關係，工業關係是行東對學徒，資本對工人的關係。在封建社會，農業關係是根本的生產關係，而工業關係，只是農業關係的副產品。爲什麼？大家都明白，封建制是由奴隸制的廢墟上來的。但封建制也是一種搾取的制度，這一點它和奴隸制並無不同。然而，爲什麼奴隸制一定要讓位

封建制呢？奴隸是赤條條的漢子，他們不僅把整日整夜工作的所得奉獻於主人，連個人的身體，也是主人的私有物。在那制度裏，很明顯的，主人卽使要絞死他們，也不肯關心生產的多少，因爲多些少些，於他們並沒有半點關係。農奴不是這樣，雖然爲地主工作的徭役制，是白白賠本的生意，但他們多少有若干時間，爲自己生產。爲自己工作的時候，他們是小心謹愼地，以最高的生產率工作着，這是刺激生產的有力因子。因此，農民不斷地和地主作猛烈的抗爭，爭取多些爲自己而工作的時間。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是在這過程中慢慢的進展着。生產力的發展，必然促成農業和工業的分家，促成農村和城市的對立，我說工業是農業的副產物，就是這樣的緣故。

封建制既是一種人搾取人的制度，但搾取關係從什麼地方表現出來呢

？農業關係的形式是什麽？地租就是農業關係的尺度。地主怎樣絞搾農民，農民怎樣受地主的絞搾，地租是一把最正確的尺度。地租形態有力役，現物，貨幣三種。那三種形態是連續而來的，最先是通過力役制，再通過現物制，最後才通過貨幣制。在地租形態的繼起中，顯示着農民對地主關係的變化，顯示着封建制度的變化。在貨幣制普遍流行的時候，農村中人與人的關係，已到了劇烈的階段，城鄉的對立，已到了最後的關頭。西歐的封建制是正常地通過這三種形態，所以封建制也正常地過渡到資本主義制。中國封建制也正常地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嗎？不是的。中國農村公社的殘餘爲中國社會播下停滯的種子，使中國社會不絕再生產，反覆了幾十個朝代，政治風雲的來來往往，不能打擊封建構成的要害。因此，由周代一直至淸末，因爲手工業不發達，商品交換不流行，地租形式，雖然早已由

力役制過到渡現物制，而現物制始終不能圓滑地過渡到貨幣制。唐宋以後，因爲莊園的發達，土地私有制的出現，也有許許多多的農民，以現錢納租，但貨幣地租，不是一般的形式，只不過在普遍流行的現物地租中，居着一個次要的地位。蘇聯史家鮑勒呵夫指出中國在紀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紀（周初），力役制已流行於各地，到了十至九世紀，現物制又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此後經過漢晉唐宋……（他說中國曾反覆了六個時期）貨幣制終不能取得優勢的地位。他說道：

「現物地租，即年貢關係，不絕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封建關係也正停留在這個形態之上，阻止着生產力的發展，且必然地把封建制帶到一個新的衰微時期」（東洋封建制度史論三二頁）。

有了這現象，使卡爾下結論說：「這形態（現物地租）與我們在東洋所

看到社會狀態停滯的基礎，完全適合」（三四頁）。伊里奇也抱着同一的見解：「在十幾個世紀中，農奴制死死地把成千成萬的農民幽禁在死亡綫上。例如俄國，由九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封建史，更來得久遠」（三四頁）。這裏伊里奇雖沒有具體地指出封建經濟久滯的原因，但他深信久滯的現象，可說沒有疑義。

貨幣地租與封建經濟有什麼關係呢？貨幣制的出現，必以工業，商業，城市的發達爲先決條件，因爲必須等到工商業發達後，人們然後廣汎地用貨幣爲流通的工具，地主然後樂得强制農奴納現錢地租。但交換發達後，地主更迫切需要金錢，他們的寄生生活，必然迫着農民連一口氣也吐不出來，使農民發生劇烈的社會分化，少數僥倖地變成了富農，其他大批大批破家失地，跑到城市，過着工錢勞動者的生活。中國社會的發展傾向

，並非這樣順利。因爲現物制停滯不前，農業和家庭工業攜着手，過着自足的經濟生活。在這特殊條件下，農民那裏能順暢地向「兩極端」而分化呢？我說：

「對資本主義的廉價商品，公社且能夠作堅實的抵抗，使資本主義不能夠一下子消滅它，那麽，對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公社自然是天大的障礙了」。我這句話是應該這樣來了解的。

第二章　專制主義與手工業

一　爲什麽封建國家不採分權制而採集權制

「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紅黃白黑，大抵相同」（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序。）

這句話是說只要一個人，就有一般人的共通性。當然，美國的白人和印度的黑人，極不相同，不，不只美國人和印度人不同，就是黑人張三和黑人李四，也不完全一樣。但他們都是一個人，都有人的共通性，人類所組織的社會，也該是一樣。英國人的，俄國人的，中國人的社會，他們的發展過程，大抵是互相一致。更縮窄些說，世界各國的封建制，都有一般

的性質。只要這個人不是近視眼或戴上有色的眼鏡，他該有這樣的結論。這一般的性質，就是：封建社會來自奴隸社會，社會內的基本階級，是地主階和農民層，封建國家是代表着地主階級的利益……。無論是較正常的英法封建制，或較不正常的中俄封建制，都具有這一普遍性。然而，各國的封建制，決不是千篇一律，從一個死板的公式來的，有的發生較早或較遲，有的歷史較長或較短，有的國家形式是分散，也有的是集權。這種不同，在各國有當時當地的特殊條件。這是說，各國封建制，並非單純的公式，並不是說，各國歷史沒有普遍的法則。

「爲什麼中國封建國家的形式是集中而不是分散的呢」？

這問題是治中國史的人首先要弄得明明白白。輕視這問題或受專制主義的外貌所迷惑的人，不是要巧立名詞，說什麼「官吏資本」，把官僚和

地主看作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物（日本大上廣末），就是要把專制主義封建制當作別種經濟結構（胡秋原王禮錫先生的專制主義時代）。當然，官僚和地主有差別，分權制和集權制也有差別，但不論外表上的差別有多大，本質總是相同，即是：地主和官僚，都是封建的支配階層，靠着農民的剩餘勞動過活；分權和集權的封建國家，都是階級對抗的武器，在它的蹂躪下，有成千成萬的農民。但同是一封建時代，爲什麽各國的政權形式不完全一致呢？

卡爾一八五三年寫信給恩格斯的時候，提出兩種原因：(1)農村公社的遺留；(2)國家管理灌溉事業。一九三一年在蘇聯出版的世界史教程的主撰者波查洛夫舉出：(1)在國境上建築萬里長城，防禦遊牧民族的來寇；(2)開鑿運河；(3)建築灌溉設備；(4)國家管理對地中海各國的

貿易（一七一頁）。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世界經濟年報的作者瓦爾加再舉出：(1)防禦外敵；(2)保護水利經濟；(3)設立米穀倉庫，調劑糧食（四八頁）。單憑這三種材料來做根據，集權國家的發生，至少有以下各種原因：

(1)農村公社；

(2)國家管理灌溉事業；

(3)在國境上建築防敵的堡壘；

(4)國家管理對外貿易；

(5)調劑糧食。

(3)(4)(5)三種原因，即防禦外侮，管理貿易，調劑糧食，當然對中央政府的發生有多少作用，不過作用究竟多大，那就不是三言兩語所能

說得明白。管理灌漑事業這一任務，也非常重要，要是讀者了解水利經濟在農業社會的作用，也許不再有疑問。但我覺得這幾種原因，祇有農村公社才有決定的意義。

為什麽我抱這樣的見解呢？請讀者先仔細玩味下面一段話，原文載在卡爾論法國政變的大作上。這裏說的是封建制崩潰後法國社會的情況：

「小農佔大部分，……他們的生產方法沒有聯系，一個個孤立起來。法國荒廢的交通機關和農民的貧困，加張這種孤立。他們耕的那塊小小的土地，用不着分工，用不着科學方法，也不讓它有什麽發展，不用什麽技術，不想有什麽豐富的社會關係。各農家是可以自給，可以直接生產大部分消費品。……這塊地是此農夫自家的，那塊地是彼農夫自家的，他們這樣集合而成村，再集合而成縣。也因為這樣，法國人民好像以同等單位而堆積着。……小農之間，只有地域上的聯系，而沒有共同的利害，他們的意見不能一致，不能聯合起來，也不能組織政治

團體。所以他們不能够代表自己，而必須別的人來代表。結果，他們的代表，也必然地變爲他們的主人，君臨在他們之上……造成了一個包攬一切的政府……」（日改造社版ME全集，第五卷二一四頁）

我以爲這一段扼要的話，對描寫公社的情景，估計公社與專制政治的關係，是最確當的。如果他們眞的沒有生產上的關係，用不着交通機關，一切生產也不請教於科學技術先生，而只長年永月地保守着牢固不破的生活環境，他們自然而然地分散爲一個個單位，像一盤散沙似的各自孤立着，也自然而然地彼此沒有統一的意志，把政治視爲多餘的贅物，於是有拿破侖專制政府高聳在他們之上，代表着他們。在這裏，中央政府管不了水利經濟，也管不了防禦外侮，對外貿易，調劑糧食等任務，唯一的原因，只是國內殘留着許許多多自成小天地的公社。我要說公社是集權制的決定

因子，不是有憑有據嗎？如果再加上其他的政治機能，如水利要設施，外敵要防禦，貿易要管理，糧食要調節等等，「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就在中國平原之上，無惡不作，無所不爲了。

二　專制主義怎樣干涉手工業

國家干涉經濟，並不是不可解的事，乃科學的歷史觀的一個根本概念。任何在黑暗社會裏過活的人，都十分明白。人類社會除了原始共產制這一時代以外，其他都是人搾取人的歷史，主人對奴隸，地主對農奴　資本對勞動，無論關係是表面化或隱蔽化，搾取與被搾取的事實，始終存在着，頂多不過是方式不同而已。然而，不論在任何不平等的制度裏，下層絕對不會平白地任人絞死了也不作一聲。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吧！正因爲不

絕有反正的事實，而支配的上層又爲着保存他們原有的地位，以傳於萬世，所以文化統制與政治支配是必然的結果。我說：「支配階層的國家，主觀上客觀上執行着利己政策，古今中外，沒有不同」。又說：「十八年前的俄國革命，已給我們一個絕好的榜樣，作逆流夢想的沙皇，早已枉費了心血，希特勒主義，慕沙里尼主義，終久也歸於徒勞」。誠然，人力不能阻止生產力的發展，卽使一時可以成功，終久也不行。所以舊的生產關係，如果不能再作生產力的推進機，它必定要打破這界限，要求新的生產關係。這是歷史的鉄則。但相信這歷史法則，不是要一筆抹煞了國家對經濟的反作用，不，剛剛相反，唯有正確估計每個時代的國家的任務，才能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才能對準當時當地的必要和可能，和反抗潮流的政治機構作抗爭。

中國專制主義最主要的收入源泉是田租，卽千千萬萬農民的剩餘勞動。歷史上秦始皇時代的窮奢極侈的生活，爲今日反動家的護身符的孔孟哲學，被人稱爲東洋文明之華的唐宋哲學，這些上層的構造，都是建築在農民的剩餘勞動——田租之上。要是城市和農村分了家，手工業成長起來，就一定會動搖田租的收入，所以二三千年來衣鉢相傳的經濟政策是重農輕商。他們不管生產進步不進步，社會進化不進化，只要問田租收入有沒有安全的保障。秦漢壟斷鹽鐵，唐宋取締水車，手工業行會不能取得市民權，國家壟斷對外貿易，都是由同一的目的出發。但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可遏止，城村的分工是必然的結果，手工業一定會滋長着，他們既然害怕生產力的發展，也唯有猛力地壓抑它，控制它。害怕什麼呢？他們害怕要打破丁飯碗。怎樣控制生產力呢？他們要包辦手工業（經營官業），對民間的手

工業，同時加以取締和壓迫。

也許有人在懷疑着。官辦的手工業，與工廠手工業有什麼不同呢？那不是一個東西嗎？硬要說兩者有不同的性質，根據在什麼地方呢？

我以爲問題不是那麼單純。在形式上，雖然官營手工廠類似於西歐工廠手工業，但在經營的本質上，却有原則的不同。第一，就人與人的關係說，官辦企業有專制政府和工奴的對立，而工廠手工業裏，對立的是資本家和工人。第二，就生產的目的說，官業是爲了宮庭的享樂生活，爲了國家的財源，而工廠手工業，却爲了市場，爲了利潤。第三，就生產的對象說，如果主要的生產，是爲了上層的消費，生產品一定側重奢侈用品，如果生產主要的是爲了利潤，一定側重日常用品。那是當然的，如果工廠的生產關係，是封建國家對工奴的關係，它就不是由生產力的增長而來，

乃官府强制的結果；同時如果生產主要的是爲着滿足帝王的奢侈生活，自然和市場不相干，在生產過程中，卽使絞盡了工奴的血汗，或者工奴也利用較進步的技術，但這種生產力的提高，不能引起封建經濟的瓦解，更不能創造新的生產方法。

專制主義，怎樣取締和壓迫工商業呢？

馬扎爾指出中國行會是由十二世紀保留至現在，至少馬可孛羅在十三世紀已遇見了這種東西。他又指出中國行會和歐洲的行會有極大的不同。他說道：「中國不曾有强迫加入的行會。在東方各國，行會普通極少限制行東的數目。這也許可由這種事實來說明，卽這裏有較發達的商業關係，商場有顯著的作用，市場對於手工業者有較好的保證，那是歐洲所不及的。中國行會與一般東方的行會一樣，其權力和威權並非依賴封建領主，

諸侯或國王的特許，征奪或賄賂而建立起來。它們是獨立地發展起來，僅僅在極稀的場合是由於特殊權力的允許而創立的」（中國經濟大綱六〇頁）。如果手工業者沒有市民權，就不能夠爭取經濟上的優越地位，如果城市不能在經濟上控制農村，新興資產階級，也就沒有爭取政權的必要和可能了。專制政府還强迫手工業者無償地爲官家效勞；唐宋時代的水碾磑（水車），又遭了政府的取締；商人的活動，也要政府一一加以干涉（船車要課稅，緡錢（一吊錢）也要課稅，商人不許置田產，國家主管貿易）。任意征發手工業者當工奴，任意摧殘技術，任意取締商業，工會又沒有獨立的權力，這一切使手工業在專制政府的高壓政策下，不能夠飛躍猛進，而始終停滯不前。

三 「龜步」的歷史也準備了資本主義的種子

中國封建制久滯於亞細亞平原上，翻來覆去地輾轉了幾個時期：周春秋戰國代表一時期，秦漢三國代表一時期，晉南北朝是一個時期，唐宋元明是一個時期，清又是一個時期。在那五個歷史的連環中，雖然中國社會總跳不出封建的圈子，但每個時期都有當時當地的特點，每個時期代表着每一種水準。在每個新時期中，封建經濟陷入了新的階段，下層或上層構造都向前跑了一步。自唐宋以後，均田制漸漸廢弛，園莊制漸漸成熟，於是土地一天天集中在地主官僚的手上。因爲土地的集中，農村公社也慢慢地失了它本來的職能，使整個社會，變成縱橫交錯的組織，有些村落，還保留着土地公有制，有些却是地主與農民互相對抗的場所。卡爾說英國執

着大砲和紡織品侵入到印度農村公社的當時，印度的村落，已變了一村落公社的最醜惡的一面」，這種狀態，當然也符合於中國封建社會的任何時代。經濟生活，有了這樣的變化，地租當然是向着貨幣形式發展。雖然公社殘餘現象；終究淸算不了，往往阻礙着這種正常路線的發展，但這種發展的傾向，是鐵一般的事實。

手工業也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生長着。封建官僚爲了過着更舒適的寄生生活，不得不要製造各種各樣的用品，並且要把過剩的用品，向國內國外市場交換其他商品。這樣可使官營工業向着較正常的路走的。私人手工業，雖然遭着專制主義的壓抑與公社的影响，但自然經濟，並非完全不變，專制政府又有發展國內市場的可能，這樣手工業自然而然地可以變爲工廠手工業。

由十二世紀至十七世紀，卽宋末元明三朝，城市有急速的進步。當時北京杭州的居民，相傳有幾百萬人，城市手工業，已發展到資本主義單純分工合作階段，小小的作坊，常有十幾個傭工在那裏工作着，屬於政府的工廠，如織造，染色，毛氈，五金，所支配的戶數，達六十至一百。十七世紀以後，卽滿清一朝，那是封建制最末的一朝，當時資本主義關係已漸漸形成起來，工廠手工業，是手工業最普遍的形式。景德鎭是製陶最出色的地方，蘇浙粵蜀是絲織工業的中心，採礦業和製鹽業也發展爲特種工廠手工業（小企業家共有生產手段），明礬，金屬和奢侈用品的生產，分工非常細微，生產的規模非常宏大。尤其自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更給工廠手工業以一個極大的刺激，甚至私人的工廠手工業，也統屬幾百個工人。在同一時期內，資本主義已經侵入老大的帝國來了。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

，俄國人，日本人、擠滿了一堂。滿淸政府遭着太平革命的打擊，已經再不能支持末運，進步的官僚，嘗盡了一切甜酸苦辣的苦頭，也思量怎樣來振作一下。因此，隨着碧眼兒的大砲兵艦的東來，新的技術也同時傳入於中國了。在開平漢陽，我們開始用機器來採礦冶金，在上海、武漢、廣州，我們開始用大機器來紡紗織布。於是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新出現兩種人：民族資本家和產業工人。康有爲的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是反映着當時新興階級的政治要求。雖然由上而下的戊戌改革運動，遭了反動官僚的打擊，而一蹶不振，辛亥革命也因爲新興的民主要素未成熟而變爲不澈底的反正，但這種政治運動是反映着當時工業生產的狀態，那是沒有疑問。

沒有資本主義的種子，列强的侵入不一定一下子就可以移植新技術，如果中國封建社會是循着正常的軌道而發展，也許不必經過外鑠的作用，

中國也自動會發放燦爛的資本主義的花朵？

第三章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

一　木乃伊一接觸空氣就開始腐爛

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着，中國歷史像龜步的爬行了二三千年，中國像一個木乃伊，封閉在眞空的棺裏。然而歷史並非靜止，中國社會雖然停滯着，但決不是萬世不變；歷史雖然爬行着，但決不像一隻木鷄，動也不動一動；雖然是棺裏的木乃伊，但把棺打開，一同外界的空氣接觸，屍體就開始腐爛了。

「一向的完全孤立，是維持着舊中國的主要條件。如今這種孤立，已給英國的武力所征服而開始崩潰，這與在緊密的棺裏所保存的木乃伊，一旦接觸空氣，

就開始腐爛是極相類的。」(卡爾：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

他這句話，在力說鴉片戰爭在中國近百年史所起的作用。我們可以說，八十年來，中國社會所有的一切動亂和變遷，都以鴉片戰爭爲出發點。鴉片戰爭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事件。但遠在所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時代，歐洲的商人，早已看上了這個「地大物博，無所不有」的「天朝」。第一個先來中國的是葡萄牙人（一五一六年），後來西班牙人來了（一五七五年），荷蘭人來了（一六〇四年），英吉利人也來了（一六三七年）。他們互相排擠，互相傾軋，終於荷人打倒了葡人，英人又打倒了荷人。爲什麼荷人打倒葡人，英人又打倒了荷人？這並非偶然，而有深刻的經濟意義。我們要明白：十六七世紀商業資本的活動和以前的活動，全不相同。從前的商業資本，是交換奢侈品，交換寶貴品的中介物，而十六七

世紀的商業資本，却是原始累積的主要源泉之一。商人從外國市場所掠得的金錢，流入於祖國而變爲資本，擴大資本主義的企業。但我們千萬不要誤解，商業的發達可以引起產業的革命，事實是顚倒的，產業的發達才引起商業的革命。因此，葡萄牙的資本，不出乎商業資本的活動範圍，也就敵不過已具有多少近代生產方法的荷蘭。卡爾說：

「近代生產方法，只有在它所經過的第一階段——工廠手工業時代，在中世紀時，它的條件已具備的地方，才出現的。我們試把荷蘭比一比葡萄牙吧。」（資本論第三卷上二九一頁）。

「大產業的條件多少佔舉足輕重的時候，才引起商業的支配。試比一比英國和荷蘭吧。商業支配的國家——荷蘭衰亡的歷史，可以說就是商業資本屈服於產業資本的歷史」（二九二頁）。

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的歷史，應徹底了解歷史轉變的經濟基礎在什麼地

方。誰具有最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誰獨霸市場的可能性也就最高。

英國的產業革命，開始於十八世紀末，完成於十九世紀初。由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一五年，那四十五年間，英國紡織工業的不況，只有五年。再由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四年那二十年間，雖然也有不景氣和恐慌的日子，可是工業始終在膨脹。這種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不是東印度公司壟斷貿易權所能包容得住，所以英國資產階級不滿貿易的獨佔，而終於在一八三四年，廢止了東印度公司，發展個人貿易的競爭。然而僅僅取消了英國方面的矛盾還不夠，中國方面；依然抱着鎖國政策，依然拒外國商人於千里之外，這樣，正因爲取消了英國方面的矛盾，而中英的矛盾，反而更來得劇烈。於是英國就不得不以砲艦政策，打破了中國的萬里長城，開闢了中國的市場。從此以後，中國就捲入了世界經濟的漩渦，中國就被開闢爲商品市場

和原料市場了。

二　殖民地化的第一步過程

鴉片戰爭後剛剛八年，發生了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明明白白是鴉片戰爭的結果，因爲中國民衆，負擔不了莫大的賠款，手工品又敵不過機器製品，大半民衆都陷於半飢餓的狀態中，所以他們痛恨貧富的不平等，要求財產的再分配，要求廢止財產的私有。太平天國運動終於給外國資本和中國封建勢力所壓服了。平了內亂之後，中國封建階級中的進步分子，眼看着非效法西洋，就不能夠活命。頑固的曾國藩，也贊成派學生出洋學科學，張之洞也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最堅決主張創辦新政的是李鴻章。他批評當時的「文人學士」只知墨守成法的，爲「不變不通」，

他駁斥他們把新政當作「崇尚異端」是「不可解」。他的新政就是：「煤鐵鑛必須開採，電綫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添洋學格致書館」。

中國的最覺悟最有眼光的統治階級，不僅企圖以中國的資本建設工業，並且預防着國家最高的經濟機構，受外資的束縛，所以最初外人要求在中國建築鐵路，租讓礦山時，中國政府就毫不遲疑地拒絕了，說是人民迷信風水。馬扎爾分析當時中國政府的心理，得一個結論，他以爲說是人民迷信風水，不過是拒絕外資的外交辭令，其實中國政府不願意外資侵入自己的國土。他引了黎佐芬在一八七〇年所說的話：「如果經營是有利的話，那麼，在任何礦區中，你都找不出風水妨害礦坑經營的條件」；再下這樣的判斷：「如果在那裏經營的是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資本，那麼，風水事實上并不阻礙工業化」（中國經濟大綱一六四頁）

中國最初出現的工廠，是太平天國運動後第一年，從暹羅回國的華僑張道藩所創辦的大絲織廠，當時，因爲民衆的反對，工廠不能不離開祖國而遷往澳門。中國最初用外資建築的鐵路，是上海吳淞鐵路（一八七五年），也因爲人民的排外思想和守舊心理，中國政府不得不以二十八萬兩贖回，把鋼軌器具一概投於基隆海中。這是資本主義發達史中的插話。軍事工業是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濫觴。李鴻章於一八六五年，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招商局輪船公司也於一八七二年成立於上海。但製造局必需煤炭和鋼鐵，輪船也必需煤炭，因此李鴻章於一八八一年開辦開平礦務局，採掘直隸的煤礦。漢冶萍公司（漢陽兵工廠，大冶熔鉄廠，萍鄉礦坑）也相繼成立。爲了便利煤炭的運輸，一八八一年，建築由開平至海口七英哩的鐵路，一八八八年，延長至大沽和天津，一八九四年，再延長至

山海關。總之，軍需工業的發展，必然引起煤鐵工業的開發，煤鐵工業的開發，必然引起交通上的改革，因爲煤鐵由礦山運到工廠，沒有新式的交通機關，是極不方便的。

九十年代的開始，中國不僅有煤鐵，冶金，輪船，鐵路，紡織也有了萌芽。一八八二年，李鴻章在上海開辦上海織布局，商辦的有華新紗廠。一八九四年，新成立的又有華盛記和裕源紗廠。

也在這九十年代，發生了中日戰爭（一八九四年），這時期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他們不但要求中國爲商品和原料市場，並要求它爲資本市場，他們所輸出的資本，或以高利貸形式，附加殘酷的條件，支配了中國的財政金融；或者投資於鐵路，造成了各國的勢力範圍，或者投資於礦山，握住了中國工業的咽喉，或者設立工廠，同中國民族工業爭市場

。想達到這種目的，先造成法律上的根據是必要的。在中日戰爭議和以後所成立的馬關條約規定：「日本國民在中國有從事活動工業的權利」。這是中國產業史上一個致命的打擊，此後外國就可以在中國開工廠，以雄厚的資本作後盾 利用中國不值錢的勞動力，來直接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了。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中德膠濟租界條約上規定於所開各鐵路的附近三十里內，允許德國開採礦產，接着各國也援用此例，中國又喪失了開礦權。

這確是不平凡的損失，外國既然可以在中國開工廠，開採礦產，中國的民族工業那裏還能夠同別人競爭，中國那裏還可以建立民族工業的物質基礎。因此，自中日戰爭後至世界大戰前，外資以不平等條約作根據，於二十年間，在中國建立了支配中國的經濟基礎。中國經濟，早已淪落為列

强的附庸了。

先看重工業方面，一九一三年，中國的礦山企業，屬於外國的有七個，屬於中國的有十一個，總共有十八個。這個數字，不能夠表示中外資本在重工業的比重。我們要檢討一下幾個最大礦山的資本關係。開平礦務局，是中國首屈一指的礦山，在義和團事件的當時，英國佔據了開平，改開平礦山爲中英合辦。中國曾企圖用資本贖回業權，可是雙方的開價不一致，到底沒有結果。後來袁世凱在灤州從事採礦，英國反對中國新成立煤礦公司，宣言與中國競爭。競爭促成了兩個企業聯合爲一，名爲開灤礦業聯合公司，業權依然操在英國手上。一九〇五年，福公司在河南開採煤礦，德人在山東佔據了最好的煤田，日本在中日戰爭後，得了撫順煤礦，鞍山鐵鑛。鐵鑛方面，最大企業的是漢冶萍公司，因爲借債關係，先後與

日本訂了三次約，規定以供給生鐵來還債。當時，每噸生鐵，成本二•五元美金，而運輸到漢陽，需要運費〇•八五美金。但按照契約，每噸生鐵僅值二•五至三元美金。這種舉世無匹的掠奪，使漢冶萍公司失掉了獨立性，變爲日本的附庸。

輕工業方面，一九一三年中國的紡織廠有三二家，外國有九家，中國的製粉廠有二二家、外國有十八家，中國的火柴廠有十家，外國有兩家。

金融方面，中國新式銀行成立以前，英國麥加利銀行已於一八五七年在上海設立分行，一八六七年，滙豐又設分行於上海。二十世紀前，在中國設分行的還有法國的東方滙理，英國的有利，德國的德華，日本的正金，俄國的華俄，道勝。一九〇〇年至一二年，美國的花旗，比國的華比，荷蘭的荷蘭銀行，日本的台灣，也相繼在中國設立分行。在同一時期

內，中國自辦的銀行，只有一八九七年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一九〇四年成立的中國銀行，一九〇七年成立的交通銀行，和浙江興業銀行，一九〇八年成立的四明銀行和浙江實業銀行。列强在中國的銀行，是中國最大的債權人，能夠支配中國的出入口貿易，能夠發展外國的工業和交通機關，能夠管理海關收入，鹽稅收入，鐵路收入，能夠支配中國的財金政融。

交通方面，外資也壓倒了華資。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築鐵路，經濟上，軍事上，都有莫大的意義。他們想運輸商品原料，想同中國民族工業競爭市場，想鎮壓殖民地的反抗，非得攫取殖民地的鐵道權，在殖民地完成侵略的鐵道網不可。所以淞滬鐵路的嘗試失敗之後，列强沒有一刻放棄過鐵道的經營。由中日戰爭至日俄戰爭，中國主要的鐵路幹綫，都操在外國人手中，由外人直接投資的，有中東（一八九六），膠濟（一八九八），滇越

（一八九五），九龍（一八九八），南滿（一九〇七）等鐵路，由借款關係而喪失路權的有京漢（一八九七）汴洛（一九〇三）正太（一八九八）京奉（一八九八）道清（一八九八）滬甯（一八九八）粵漢（一八九六）。中國自辦的鐵道，只有吉綏（一九一二）漳廈（一九一〇）二線，那簡直比小巫見大巫還要難過。

總而言之，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帝國主義已吞沒了中國的煤礦，將鐵礦附屬於自己的指揮之下，支配了輕工業方面最好的工廠，擁有最主要的財政和貨幣組織，將整個鐵道交通，都抓在自己的手中，把持了對外貿易，攫得了南滿一切經濟的支配權，造成了開闢商埠租借地和不平等條約制度。

三　黃金時代的發展傾向

一九一四至一八年，是世界大戰的年頭。大戰是英德，德法，德俄的經濟政治矛盾不可調和的表現，他們格殺了四五年，毀滅了五分之一的生產力。戰爭雖是經濟利害關係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戰爭對於經濟也引起驚人的影響。對大戰的經濟意義，瓦爾加說了這樣的話：

「世界戰爭是今日的資本主義轉到沒落期的過渡。……

「由於世界戰爭極端破壞了物質的生產手段和人類的勞動力，不僅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絕不能調和，反而造成了經濟混亂的狀態，使今日的資本主義，轉到革命的過渡時期。」

所謂革命的過渡時期，就是戰後總危機。總危機經過了三個時期，第

一時期是生產、商業，金融極端混亂的時期，一九二一年到了最高峯，一九二三年爲終結點。由一九二三年至二七年爲第二期，是暫時穩定，經濟復興的時期。生產一突破戰前的水準以後，資本主義就過渡到第三期。在這時期中，因爲技術的進步，資本集積集中和獨佔的進展，使資本主義的內在與外在矛盾完全表面化，引起了空前的大恐慌，終結了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

我想先來說一說大戰中四五年和戰後第一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什麽樣的新變化。

大戰中，歐洲同盟國方面（德奧匈）完全與中國斷絕了關係。協約國對中國的貿易，也不比當年，他們的工業爲軍事而工作，許多食糧及其他用品，反靠東方供給；印度的工業，也爲戰時而工作，退出了中國市場。

那時只增加了美國尤其日本在中國的地位。資本輸出方面，歐美一時幾乎和中國失了聯系，只有日本在中國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橫濱正金銀行的三千萬元借款，西原的二萬萬元借款，還有漢冶萍公司的借款，在上海青島漢口建立紡織工業，在撫順鞍山擴大煤鐵的開採，都是那幾年所佈置的天羅地網。

有了這絕大的轉變，中國的對外貿易，入口方面並不增加，出口方面反而增加，因爲入口的競爭非常軟弱，出口反而增加，中國就强烈地感到商品的飢荒，中國民族工業，開始猛烈的發展，尤其是紡織工業，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戰後的最初幾年，世界的生產，商業，金融，都陷於莫大混亂的狀態中。在國際關係方面，舊的關係已經破壞，而新的關係又未曾建立起來，

戰時龐大軍費的支出和戰後所負的戰債，賠償，在各國引起了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這一切造成了國內經濟政治的深刻危機。總之，在大戰中，帝國主義不能不暫時放鬆壓搾中國，戰爭了結的最初六七年，爲着應付混亂的經濟組織和政治機構，也沒有進攻殖民地的可能。遇着這千金一刻的機會，在一九一四年後八九年間，中國民族工業，像雨後的春筍，大有萬花撩亂的美觀，所有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有了突飛猛進的景象。下列統計，表示着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前後的壯觀：

紡織工業

年度	工廠數	紡錘數	布機數
一八九七	七	三五九、〇〇〇	一、七五〇
一九一五	二二	五四四、〇〇〇	二、二五四

一九一九	二九	六五九、〇〇〇	二、六五〇
一九二一	五一	一、二三八、九〇二	六、六五〇
一九二三	五四	一、九四三、六二七	八、五八一

上海絲織工業

年度	絲廠數	水鉢數
一九一〇	四六	一三、二九八
一九一四	四六	一四、四二四
一九一六	六一	一六、一九二
一九一八	七一	一九、二〇〇

重工業方面，煤炭生產，一九一三年有一千四百萬噸，一九一四年有一千五百萬噸，一九二〇年有二千零三十萬噸，一九二三年有二千二百六十萬噸。鐵礦生產，一九一三年有九五九千噸，一九一四年有一、〇〇五

千噸，一九二〇年有一、八六五千噸，一九二三年有一、七三三千噸。鑄鐵生產，一九一三年有二六七千噸，一九一四年有三〇〇千噸，一九二〇年有四二七千噸，一九二三年有三四三千噸。

單看數字，確然是萬花撩亂，確然是黃金時代，但我們要注意：在猛進的數字上，隱藏着什麼發展的傾向。原來輕工業的猛進，是帝國主義在戰爭前後不能侵略中國的結果，這裏已埋伏着第二期世界經濟穩定後中國民族工業的危機。馬扎爾還指出：「在這時期，工業發展的重要障礙之一，就是機器的缺乏，不能獲得它們所需要的數目。總之，國內缺乏生產工具的工業部門」（二〇五頁）。帝國主義對生產工具的壟斷，帝國主義出死力阻止殖民地半殖民地重工業的發展，是中國工業的致命傷。殖民地脫化說不能夠成立，這種見解在政治上的危險性，這裏又再得一次證明了。

重工業生產，也在猛進，可是煤礦早已落在英日的手中，鐵礦早已給日本一手壟斷，即使中國自己的經營，也只爲人家製造重工業原料，於中國工業的發展，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金融財政方面，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外國銀行由二十一家增至三十六家，分行由一百二十一家增至一百五十六家，中國銀行由十九家增至二三三家，分行由一九〇家增至三八七家。外國銀行的資本，不易計算出來，理由是他們的總行，大多不在中國，可是它們支配了中國的財政和貨幣，並且以海關，鹽稅，鐵路的收入，作流動的資本，君臨於中國銀行之上。中國近代銀行，只有一億八千萬金元的資本，當然沒有資格同外國銀行競爭。而且外國銀行，壟斷了中國的對外貿易，民族工業又因爲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中國銀行，覺得無事可做，

不得不以買賣公債，投資標金爲主要的事務。

在交通方面：鐵道因爲外國直接或間接借款的關係，早已喪失了路權。海路交通方面，馬扎爾估計中國船隻在十年中差不多增加十倍，以整個範圍論，江河和沿岸的船隻，中國資本佔百分之三二，海洋航行的船隻，佔百分之十。同時他指出：只在戰爭的時候，只在載重下感覺到利害衝突的時候，只在這方面的競爭不是輪船公司爲載重而是爲入口出口的載重的時候，中國航業才有發展的可能，此後因爲失了這些條件，中國在內河和海洋交通中的載重，就不是增加而是減少。

中國民族工業，只有末路一條，中國的特殊環境，是不許我們作資本主義的好夢的！

第四章　在歧路上的中國經濟

一　第二期與中國工業化過程

一九一八年爲總危機第一期的開端，一九二三年爲它的終點。在那時中國新興工業蓬蓬勃勃地成長着，一時出現了空前絕後的全盛期。但不幸得很，自從一九二三年以後，開始了中國工業化的危機。這所謂危機，並不是說工業化過程的完全停頓，乃是工業化速度的停滯，在紡織業上，在煤鐵礦上，都同樣表現着生產速度的停滯，衰微與凋落。

這一轉變，把「殖民地脫化說」的謬見打得粉碎了。什麽是殖民地脫化說呢？這派的人，相信殖民地在帝國主義的支配下可以一帆風順地完成了

工業化的過程，和平地脫出殖民地的狀態，而變爲一個獨立國家。這論調魯易的話最足以作代表，他說道：「帝國主義的新政策，已使印度漸漸脫離了殖民地的地位。印度已由屬領而變爲自治領了。……印度已由落後的，非獨立的農業國轉變爲一個近代的工業國，在英帝國爲一個獨立民族的聯邦了……」。

這見解是怎樣愚弄着歷史的事實呢，可讓以下舉出的材料來作辯護人。我們讀魯易的話，感覺他似乎抱着這樣的見解：（1）帝國主義不會阻礙殖民地工業化，在獨佔時代，殖民地也可以循着英美走過的路徑發展；（2）帝國主義毫不容情地破壞殖民地的封建的，以至一切前資本主義的關係，把殖民地改變了一個樣子，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事實眞的是這樣嗎？殖民地眞的可以在帝國主義的祝福下，與先進國同登工業化之門嗎？

讓我先從第二期世界經濟的動向說起吧！因爲這一世界史的過程，不折不扣地證明了魯易派的見解，原來是暗暗地偷運改良主義派的私貨，用別的表現形式，來擁護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

在第二期，帝國主義借助於通貨膨脹政策和產業合理化的施行，一時在火坑裏把沒落的世界救出來。因爲通貨膨脹有利於資本的集中，合理化運動，可以盡量搾取工人，提高生產，因此，到了一九二七年，全世界的生產，已恢復至戰前的水準，世界經濟已進入第二期——暫時穩定，但暫時穩定首先犧牲了國內的工農大衆，削弱了全國的購買力。資產階級爲着鞏固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只有加緊開工生產，一面利用國內的獨佔地位，保證超額利潤，一面再把過剩的商品，運出國外市場，同敵人爭個高下。於是在世界市場上開始了猛烈的競賽，市場爭奪戰「到達了前所未見未聞

的劇烈性」（拉賓斯基語）

向着什麼市場開刀呢？避實就虛，乃兵家的常法，當然先擇無抵抗的地帶，乘虛而入吧。那理想地帶，是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呢？不是的，因爲在這裏你來我往的報復政策，使競爭者不得其門而入。也不是蘇聯，因爲蘇維埃經濟政策，不准魔鬼闖入樂園來搗亂。最理想的對象，乃是殖民地，尤其是一向被認爲典型市場的半殖民地中國，「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列强爲了打開恐慌的局面，拚命地向着中國市場下總動員令了」。

在黄金時期，我們的重工業已在英日的共同把持操縱之下，只爲着敵人製工業原料。到了第二期，這傾向是更加明顯了。

在一九二五年，外資在中國煤業所佔的投資額爲五四%，華資佔四六%，再過了四年，即一九二九年，外資的比重大大的增加，佔總數的

七二%，而華資只佔二八%，比重是大大縮小了。又由一九二三至二八年那六年間，煤炭出口超過了入口六•九二六•〇〇〇噸，出超的總數爲採掘全部的五%。中國國內煤炭的消費，主要的是燃料，供給鐵路和輪船，只有小部分供給工業。列强在殖民地最迫切要求鞏固原料市場，這結論最好的證據，再沒有比中國更好的了。

鐵礦方面，由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五年的期間，鐵礦的採掘增加了一一〇%，出口增加了三〇〇%，但國內的消費，只增加三五%，這趨勢指出鐵礦出口的增加比採掘多了三倍，比國內消費多了十倍。也在同一時期內，鑄鐵增加了一〇八%，鐵和鋼的入口增加了一六八%，出口增加了一二四一%，但國內消費只增加一〇三%，出口是以極大的速度增加着，十倍於製造和消費。而且自一九一九年以後，鑄鐵的製造和消費一直減少而

沒有增加，但在一九二六至二八年，鐵出口比一九二五年反而增加。看了這數字，可以證明鐵工業的生產是怎樣像龜兔競走似的紆進着，可以證明國內的生產又怎樣爲敵人作嫁衣裳（日本在鐵業中占九〇——九五%）。

紡織業是中國現代化工業的代表，發端於十九世紀末，而全盛於大戰期間。由一九一六至二四年，華資紡機錠數差不多增加四倍，但在華日廠錠數由一九一七至二四年，竟增加了七倍以上。華廠的增加，總趕不上日廠。那是全盛期的好況，然而，好況永遠不再來了。由一九二四至三四年的十年間，華廠錠數僅僅增加三分之一，布機增加二分之一，日廠錠數却增加至三分之二，布機增加到三倍以上。那是當然的，日廠建築完備，廠內有新式機器；日廠可以低利借款擴充營業；日廠有充分的資本屯積棉花；有很好的受過訓練的工人；在轉運上，不受厘金的掣肘；輪船公司又

許可日貨附低運貨：可憐的民族工業，那說得上是他人的敵手。

其他輕工業如火柴廠，水泥廠，粉廠，玻璃廠，皮廠，糖廠……，我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差不多在所有工業部門內，外國的企業是最大的，設備最好，資本最充足的」。

二　帝國主義與中國農村

一九二七年魯易在莫斯科說印度「已由落後的，非獨立的農業國轉變爲一個近代的工業國」。一九三一年嚴靈峰先生在上海說「帝國主義在中國是絕對地要破壞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要推動中國整個社會向着資本主義過程發展和擴大，……」又說「帝國主義是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直接因素……」。（中國經濟問題研究自序）一個所說的對象是印度，一個

所說的對象是中國，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帝國主義是「絕對地」改變殖民地的生產關係，把它們引入資本主義的殿堂。不論是印度黑人，或東方支那人，他們都沾着帝國主義的洪福而近代化。

眞的有這樣乾脆的事嗎？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到東方來，眞的把東方社會的一切落後的關係一掃而空，在亞細亞平原上，建築起資本主義的天堂嗎？

在歐美二大洲，資本主義打破了封建的農業關係，一面集中所有的土地，經營大規模的資本主義農場，一面强迫農民離開土地，使他們變成自由的農民，變成農業勞動者或工業勞動者。這一革新運動，能夠推進農業生產力，推動工業生產力，能夠造成一個資本主義市場。這是創造新的生產方法的過程，資本主義所以能夠打破封建制度 從封建生產關係之上建

立起來，原因也就在這裏。

資本主義侵入以前，中國是一個封建國家，因爲社會的一切，都建築在農民的剩餘勞動之上。這種關係，一直保存至十九世紀中葉，保存至帝國主義的大炮和商品攻陷了萬里長城的前夜。列强的勢力侵入以後，中國封建的農業關係，發生什麽變化呢？在殖民地國家裏，列强資本演着一個什麽角色呢？列强「絕對地」沒有促進殖民地資本主義化或發展殖民地的生產力的動機，它們時時刻刻只打主意怎樣從那裏搾取最大的利潤，以飽滿他們大腹便便資本家們的腰包。他們的必要在於把資本主義的商品，向殖民地大批大批的輸出，再從殖民地購買極廉賤的工業原料，來擴張本國的工業。要是殖民地的手工業以至機器工業，爲了商品的輸出而崩潰，沒落，農業爲了原料的被採掘而變了畸形的發展，或阻止着殖民地工業化，

這一切可說對帝國主義都沒有半點關係，他們的算盤，滿不在乎。向殖民地輸出資本，目的同是一樣。所有輸出的資本，大半不是工業資本，只是借與殖民地政府的國債，帶上很濃厚的高利貸性質的國債。卽使投資於工業，也不過製造一些直接加工的商品，建設一些有機的構成極低度的輕工業，並且利用這種產業，來搾取殖民地的不値錢的勞動力，他們決不肯發展殖民地的機器工業。

獨佔時代的資本輸出，是殖民地脫化論者的理論根據。他們以爲資本輸出於殖民地，乃殖民地工業化的基礎。那不消說是不近情理的說法。先拿印度來說吧。大戰前的幾年，每年英國資本輸出於印度達一千三百萬以至一千六百萬鎊。戰後，大大地減少了，或二百萬，或三百萬，一九二七年只有八十萬。戰時與戰後，輸出印度的工業資本，僅及總額百分之

十，在一九二一至二三年所投下的九千四百四十萬鎊中，有七千萬是充當政府的公債。資本輸出不能促進工業化過程，還值得疑惑的事嗎？

不錯，帝國主義用購買原料和推銷商品的形式來搾取農村，結果必摧殘農村手工業，或拿洋貨和機器製品，來代替農村的手工業，使農民必須依靠於市場，購買一部分生活資料，同時又出賣一部分農產品。他們甚而再進一步，壟斷農產市場，促進農業的商品化，使中國的農業，通過市場關係，（當然要半封建關係幫他們的忙）而受資本的支配，使中國農民，通過市場，而受資本的剝削。然而，這只是農業商品化的進展，並不是說農業已向着資本主義的道路自由發展。因爲（1）城市工業不能向着資本主義自由發展；（2）農產完全受列强資本的控制，地主富農不願向農業投資；（3）封建殘餘有意無意地受帝國主義的扶殖來摧毀農村經濟；要想建

立資本主義農業，簡直是癡人說夢。

總之，帝國主義侵入以後，中國農村經濟所起的變化，只傾向於商品化，農業生產方法的改變，仍受着莫大的阻礙，造成了目前急待解決的土地問題。究竟農村土地所有關係是怎樣？人與人的關係是怎樣呢？

據陝豫蘇浙粤桂六省的調查報告，地主富農佔村戶九・九%，但他們所有的土地佔六三・八%，中農，貧農，雇農佔戶數九〇・一%，所有的土地只佔三六・二%。人數不上十分之一的，所有的土地竟佔十分之六以上，反之，人數在十分之九以上，所有的土地只有十分之三。土地分配的不均等，不但表現於數量上，而且表現於質量上。華南的水田，當然比華北的旱田肥沃些，因此，土地集中的程度在南北兩地不均等，華南十二省佃農和半自耕農約佔六一・五%，自耕農只佔二八・五%，華北十省自耕

農佔六〇•七%，佃農半自耕農只佔三九•七%。華南土地比華北是集中了。總之，地主富農佔了最多最好的土地，而且土地又一天天集中起來，十分之九以上的雇農，貧農，中農，因爲沒有土地，或土地不夠自食，不能不低頭向地主富農租田。當然這種田租關係不是資本主義式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家和地主同是平等的分子，工業家把一部分工人的剩餘價值分配於地主，大家的收入，接近着平均利潤，彼此都不能互相欺騙。中國農村的半封建田租，並非這樣的範疇，地主的收入，不僅包括農民的全部剩餘勞動，連農民的一部分必需勞動，也要來侵犯。據估計全國地主的土地，約有十分之九，分割開來給佃農耕種。富農只利用自己勞動力，來耕種自己的土地，很少租地雇工，從事大規模的生產，常常還把自己一部份土地，出租於人，過着半封建地主的生活。剩下廣大農民大衆（包括佃

農，農貧，一部分中農），城市拒絕他們，在農村又找不到工資生活，只有俯首下心，向地主富農租田，甘心忍受封建的剝削。

帝國主義的侵略，破壞了農村的自然經濟，緊緊地把先進國的大城市和中國腹地的農村，聯系起來，使農村失了自給自足的基礎，使農民破家蕩產，使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上。然而商品經濟不能過渡到資本主義，所以農民然雖在農村得不到一溫一飽，也不得不忍着痛跳入半封建的火坑中。在殖民地政策下，地主富農以出租田地徵收苛刻的田租爲本業，所以半封建的收租地主和半飢餓的佃農的對立，乃是中國土地問題的核心。半封建的土地關係，是中國農業革命當前的主要任務。

三　白銀跌價與民族工業

想更透澈了解中國民族工業，尤其是被稱爲民族驕子的紡織工業，我以爲白銀問題，應該附帶說說。在戰後的幾年，白銀開始跌價。銀價一向不斷地下降，原因是生產技術的進步，和世界市場對白銀需要的減少。戰時銀價的上升，只是一種不自然的曲綫。印度退出銀本位制以後，用銀的只有一個中國，戰後印度不只不買銀子，反把政府的存銀賣出去，所以中國代替印度的地位，而爲銀子的最大顧客。銀價下降，表示中國主要的貨幣本位和財貨價值的低落，用銀子來彌補對外貿易的出超，和償付借債賠款，中國要吃大虧，機器和原料的入口，處於不利的地位，削弱了國家的購買力。

但金貴銀賤的風潮，反使許多懷着幻想的人以爲這樣可以加强民族工業的競爭力，可以作爲阻止洋貨入口的防壁。一九三一年中國銀行的營

業報告就有這樣的話：

「最近三年前，因爲金貴銀賤，國內工業品的價格比入口的貨價格便宜，所以中國工業也呈着好轉的機運」。譬如在上海，以銀價來表示船來品的指數，如果一九二六年爲一〇〇，一九二九年爲一一〇，一九三一年爲一五三。因爲有這樣的變化，中國工業生產因而增加，洋貨入口也因而減少。請看下表：

年度	棉織工業			捲煙		火柴	
	布機	棉布生產	入口棉織品（百萬磅）	生產（千箱）	入口（百萬枝）	生產（千箱）	入口（千箱）
一九二七	二五、八一八	一四、六五八	八六八	七五〇	九、五四七	六〇〇	八、四二四
一九三三	三九、五六四	二〇、一二八	三七二	一、一二三	二五〇（東北不在內）	八〇〇	七三

其他許多新企業如橡皮品，肥皂，帽子，紙，墨水，鉛筆，電燈，收

音機，粗機械品，水泥，磚瓦等，在恐慌的期間中，在上海香港接二連三地滋長着。然而，金貴銀賤所造成的假態繁榮，真的可以使人舉杯相慶，或同日本人合唱「孤島繁榮」的小調嗎？瓦爾加對這假態繁榮的評價極適當，他强調以下的幾個特點：

第一，出口半製品(絲，茶，豆油)，遭着最深刻的恐慌；

第二，輕工業方面的生產與企業的增加，大部分是外國資本（列强把不值錢的銀子運入中國來開工廠，發洋財），這樣反增加帝國主義的支配力量；

第三，依靠於工錢的削減，工作時間的延長，勞動强度的加高，輕工業才有些微的進展。

在廻光反照的一瞬間，也許有使人驚異的表情。我以爲這一切光怪陸

離的事實，其實是大危機的噴火口。「因爲是半殖民地，所以到處遇見帝國主義的屠刀，因爲是半封建，所以到處碰着封建勢力的毒刺。在這些屠刀與毒刺共同作祟的形勢之下，整個中國民族經濟，自然被蹂躪得千瘡百孔，體無完膚了。」（錢亦石先生語）

第五章　中國革命的特質

一　革命的統一性和不平衡性

政治運動是經濟關係的產物，有什麼樣的經濟關係，就產生什麼樣的政治運動。資本主義雖然已統治着全世界近一百多年，但它的發展極端不平衡，不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水準，不能夠一致，即使在資本主義的體系內，也有高低强弱一流二流的差別。當然，這種經濟生活的聯系性和不平衡性，使世界革命運動也呈着統一性和多樣性。因此，目前雖然有些國家的革命要採甲種形式，有些要採乙種形式，有些要採丙種形式，但最終的目標，可說是異途而同歸。各國革命採着什麼不同的形式呢？第一流資

本主義國家如美、英、德、法等，它們採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式，第二流資本主義國如日、西、葡、匈等，它們採着先完成民主革命接着再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式，一般殖民地半殖地如中國印度等，現階段的革命形式是民主革命。。

爲什麽第一流國家要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呢？這一類國家，有高度的生產力，生產已經集中起來，小企業沒有多大的重要性，而民主主義政體，也早已存在着。因爲生產已經社會化，議會政治已經完成，這裏提出來的政治任務，自然是直接實現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建立工人政權，在經濟上沒收一切大規模的企業，建立各種國營農場，使社會主義企業和集體農場，急速地發展起來。

爲什麽第二流國家要先完成民主革命接着再執行社會主義革命呢？因爲這些國家，半封建的農業關係，佔着重要的地位，社會主義的必要物

質條件，未充分具備，民主革命也未澈底完成，總之，資本主義的發達，只達於中等水準之上。它們採着兩種可能的革命形式：（1）先實現民主革命再急速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2）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同時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兩種形式都有可能。在執行第一種形式的時候，社會主義不是一下子可以實現，必須先經過民主革命，然後達到最後的目的；相反的，在執行第二種形式的時候，工人是農民運動的領導者，農業革命是最主要的課題，卽是：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革命勝利之後，交換關係還居重要的地位，所以要怎樣推行集體農場或國營農場，要怎樣變小農生產爲大規模的生產，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主要的任務。也因爲這樣，社會主義的速度很遲滯。

爲什麼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定要實現民主革命呢？它們的生產水準，已

達到什麼階段呢？那裏的工業已有多少萌芽，且具備着一定的模型，但既有的工業，不夠建設社會主義。同時，那裏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關係，還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帝國主義，又壟斷所有最重要的工業，商業，金融，財政，交通，和大規模的農場。因此，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前資本主義，徹底要求解決農民問題，與對抗帝國主義，徹底執行民族解放運動，是革命的中心任務。在這裏，必須先完成民主革命，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因爲如果不先通過這預備工作，不先經過由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最高級的革命形式，不能建立起來。而且因爲生產水準不高，也必須取得工人專政國家的援助，社會主義建設，才能夠順暢地進行。

就這樣的複雜關係而言，革命決不是腦子裏的空想，也不是急進小資

產階級的幻夢，它有一定的步驟和一定的等級，不能跳躍，不能躐等。這樣雜色性和多樣性，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平衡的結果。同時，資本主義世界，是一個有機組織，所以革命不論在那一個角落出現，採着什麼形式；其浪潮一定會波及於全世界，影響到全人類的歷史。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在全世界再沒有一塊地方可以孤立的今日，一切形式不一的國家的革命運動，都是全世界轉變的一種徵象。目前，侵略者羣已站在同一的戰線上，被侵略者和一部分被排斥者羣也站在同一的戰線上，你要擴大防線，他又要擴大防線，把全世界人類，劃分為兩大對抗的營壘，不是最明顯的例子嗎？世界上一切大小事件，由西班牙內戰至中日交涉，由德國元首希特拉在紐倫堡的宣言至法國革命黨領袖多萊士在巴黎親王公園的演說，都引起不同營壘的人們的同情和憤怒，贊成和反對，不是最好的證據嗎？這

一切在說明隔岸觀火時代已經過去，目前全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決定人類歷史的二大對抗勢力！最後的關頭已擺在人類的面前，我們在正處在戰爭和革命的前夜。

二　中國革命的根源和性質

一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甚而至在經濟水準最高的國家中），生產力的發展固不能望美、英、德、法第一流國家的項背，即使比第二流國家如日波等，也大大減色。因爲近代產業不發達，生產手段不集中，勞動社會化的程度不高，工錢勞動者不多，農業生產關係又大半保留着中世紀的前資本主義的要素，所以革命不是純社會主義，也不是帶着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社會主義或急速轉變爲社會主義的民主革命。它的經濟發展的水準規定着革命

的性質是民主革命，即一面要打倒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搾取和壓迫，實現民族的自由解放，一面要廢除一切前資本主義關係，爭取工業自由發展的條件，一句話說，殖民地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

中國是國際資本主義共同壓搾下的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所以有人要問中國革命的性質，我們也絲毫不用遲疑的答道：「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半殖民地(中國)革命的對象有一點和殖民地(印度)不同，即是：革命的最大敵人——帝國主義，不只一個，而有若干個，例如中國，主要的外敵，至少有日英美三國。雖然對象有多少的不同，但要完成反帝反封建這二重任務，絕不會不同。因爲外敵不論一個或幾個，對生產關係是沒有影響。爲什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呢？這兩重任務有沒有關聯呢？是一重任務的兩面，還是兩個互相隔離着的任務呢？是不是過去的民主革命的重演

呢？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過程中，怎樣過渡到社會主義呢？

這幾個疑問關涉到革命的根源和性質問題，和關涉到革命的轉變問題。現在首先要問：中國爲什麼要革命？中國革命爲什麼要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和肅清一切封建餘孽以至前資本主義的關係？

前幾章已說過中國封建制的爬行，緩進，資本主義經濟的水準，半殖民地國家的形成；又說過帝國主義經濟與中國國民經濟的比重，封建農業關係的優勢地位。在那裏可以看到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所引起的經濟生活的劇變。從前中國人用的是土棉土布，如今用洋棉洋布，從前用的是菜油，如今用煤油，從前用灰鹼，如今用肥皂；在今日，洋火代替了以前的火石，洋煙代替了粗煙，洋紙代替了土紙。以前南船北馬是交通的機關，如今在鐵道上公路上一來一往的是火車和汽車；以前過着手工業的半自然

經濟生活，如今在大城市大都會裏出現了機器，出現了煙突。一句話總結，資本主義生產，打倒了手工業生產，把幾千年不變的封建國家，屈服於資本主義之前，使中國戴上「近代國家」的外貌。中國的確是披上了近代國家的外衣。但外衣是外衣，裏面還保留着不少過去的殘蹟，已改變的，也只不過更適合於帝國主義的搾取，使中國變成一個畸形的國家而已。近代產業所不可缺少的煤鐵，始終握在帝國主義的手裏，在中國這大地上，能夠勉強算得上近代產業的，祇大戰中僥倖地發達的紡織及其他一二輕工業。在帝國主義的壓搾下，中國的生產力，永遠沒有合理的發展，使中國陷入慢性恐慌的深淵中，在深淵中呻吟的是極少數買辦，地主，軍閥以外的全民族。所以中國的被壓迫民衆，無論民族資本家，商人，工人，農民，都要起來打倒橫暴的帝國主義，解放民族的束縛，爭取民族產業的自

由發展。這種民族革命的要求，早已出現於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中，可惜當時城市缺少了領導的勢力，終歸於失敗。爲了同一的緣故，辛亥革命也變成不倫不類的反正。可是自從大戰以後，中國民族產業蓬蓬勃勃地興旺起來，即由一九一四年至二三年，約莫十年的光景，造成了中國工業的黃金時代。自一九二四年(第二期)以後，魔手重伸到中國來，他們並要在中國取回大戰中的損失，所以民族工業家被打得焦頭爛額，也不能自救。他們要求關稅自主，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要求撤消厘關，要求統一中國，建設民族的國家，即要求民族工業的自由發展。當然，他們是爲了自己階層的利益而提出這樣的要求，並且也不能完成這種任務，但這一要求是全民族共同的要求。把中國引入全殖民地道路的奴化政策與建立獨立自由領土完整的中國的革命任務大撲鬥，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個主要的根源。

第二，三億二千萬的農民大衆，自從帝國主義侵入後，結果只有破家蕩產，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卽使能僥倖地保留着幾尺貧瘠的土地，也不能求得一飽。向地主借田，納租要在總收成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軍閥是農民的死對頭，他們要强迫納稅，拉夫，徵發，濫發紙幣。高利商業資本，更在趁火打刧，使農民的土地，漸漸集中在地主軍閥的手中。再加上災難和內戰的交織，弄得他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要有封建關係的存在，農民只有九死一生，因此迫着他們要求(1)改革目前的土地關係，沒收地主的土地，(2)推翻封建的統治，取得農業經濟自由發展的條件。封建地主和農民的矛盾，是中國革命的第二個主要的根源。

第三，民族資產階級出現以後，接着工人階級也出現了。歷史註定他們不能調和，尤其因為民族工業受着重重的束縛，競爭力非常微小，他們

要撐着垂死的局面，一定是無法無天的加強對勞動的搾取，以補償自己的損失。中國工人，每天要工作十四小時，外國資本，不惜長途跋涉，來中國開工廠，勞動力不値錢乃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中國，市民階層沒有本身的武力，保護勞動工錢網的，同時是保護封建搾取網的軍閥，因爲他們已經混成一家，所以在政治上彈壓工人的行動，在組織上取消工人應有的民權的，也就是軍閥。軍閥所支配的近代產業——官營工廠、鐵道、郵局、兵工廠、造船廠等，是直接壓迫工人的機關。最應注意的是工人和帝國主義的不兩立。帝國主義佔據了中國經濟的命脈（製鐵業外國資本佔九五%，煤業佔七二%，紡織業佔三六%）。這舉足輕重的外資，才是工人的死對頭。工人不但以一勞動者的資格給他們剝削着，還以一個被壓迫民族的分子給他們壓迫着。他們又維持着中國的封建勢力。工人對帝國主

義、軍閥和市民階層的抗爭，是中國革命的第三個主要的根源。

這三個根源三個基本條件匯合而爲一：(1)漢奸以外的民族大聯合的解放鬥爭，(2)推翻封建榨取網的農業革命，(3)取消工錢勞動制度的工人運動，即是反帝反封建反資本的運動，是中國革命的基本條件。但反資本的運動，是最高最終的目的，在歐美各國，是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的產物。雖然中國不會再走着歐美的道路，先完成民主革命，建立一個「近代國家」，再讓工錢勞動者流一次血。我們不應有這樣傻瓜的想法。中國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就同時解決着社會問題。然而不論先來第一着，再來第二着，抑或在第一着中就準備着解決第二着的前提，在第二着未來之前，必先通過第一着，那是沒有疑問。好比登梯，是一級一級地上升的。因此，在民族被壓迫着與封建關係殘留着的國家裏，工人羣衆必須先

來解決革命的預備工作，爭取消滅工錢奴隸制的先決條件。總而言之，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當前問題。

三　中國革命與民主革命

一提到民主革命，人們的腦袋裏就常常想起英法等先進國家在資本主義初期所經歷過的革命形式。是什麼性質的革命呢？這是以農業革命爲目標，推翻封建階級統治的民主革命，卽是：在經濟上要打破農村的封建關係——解放農奴，沒收土地，分給農民；建立近代工業所必需的全國市場——商業自由，廢除厘關；擀除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行幫制；在政治上，要實現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設立國會，統一全民族。這裏革命的

領導者，是新興資產階級，革命的敵人，是地主階級，所以革命首先要打倒它，肅清它。革命勝利以後，資本主義生產迅速地建立起來，造成了一個近代國家。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也是民主革命的一種。但俄國革命是發生在帝國主義時代，卽工人已有非常强大的勢力，足以推翻工錢勞動制度的時代。在那時代，市民階層不僅不能夠站在民衆的前頭，領導着革命向前邁進，等到鬥爭劇烈的時候，卽工人以大無畏的精神，勇猛直前地領導着農民，結成工農聯合戰線的時候，俄國市民階層立刻屈服於沙皇，背叛了革命，所以革命在俄國，不採着純粹的民主革命。因此，俄國革命，也必須依靠於工農的聯合，然後宣告完成。

俄國革命的經驗，對了解中國革命性質是很好的材料。然而中國革

決不是俄國革命的重演，因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起於總危機時代，革命的元兇是帝國主義。這些是俄國所沒有的新景象，而這新景象，正是中國革命的特質。

反帝的任務，對革命會發生什麽影響呢？中國的眞正主人，你說是地主嗎？軍閥嗎？決不是的。如果在中國，只有這羣宵小的勢力，中國早已不是今日的中國了。你說是市民階層嗎？或是他們的三位一體的政權嗎？也不是的。要是只有他們，他們恐怕也早已沒落了。只有憑藉着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他們才敢大肆咆哮，作威作福，甚而至無所不爲。所以在他們的背後，盡指揮操縱的能事，把他們當作工具的是帝國主義。不澈底反帝，農業的危機和土地的飢饉，終免不掉。這反帝的任務，對民族革命戰線的聯合形式（階級關係），有極大的影響。爲什麽？由於帝國主義

對國民經濟的阻滯作用，使全國民衆都自動起來，要求民族的解放與獨立，使民族資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工人，都聯合在一條戰線上，實現國民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雖然革命初期的火把，是由智識分子燃燒起來，市民階層在過去的國民革命時代，也領導過革命工作，但革命的最後擔當者是工農民衆。這革命主體的變化，使革命政權不是普通所謂「國民會議」，而是工農民主主義，即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我相信：中國將來的革命政權，是工人農民的民主主義，也就是中國走向非資本主義，嚴格說，是社會主義的過渡」。不是普通的民主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轉到未來社會的過渡形式。

革命起於總危機時代有什麽意義呢？總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的沒落期。在目前，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已建立了新的政權，二三矛盾集中的資本主義

國家，革命危機的前提條件已漸漸成熟起來，在這時代，中國的民主革命，自然不會是過來的重演，不是單純爲了取得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決條件，乃在先進工人國家的援助下，不通過資本主義，而和平地轉入社會主義階段。

目前的政治形勢，不容許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的天堂，革命的擔當者是千千萬萬的民衆，這客觀的革命形勢和革命主體的變化，規定着中國革命採着新的形式，規定着中國革命不是過去的重演。

第六章　革命動力與革命聯合

一　封建勢力是帝國主義的爪牙

說過革命性質問題以後，接着革命動力問題是自然而然地要提出來討論。既然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目標，但那些階層，那些黨派，才能澈底執行這任務呢？當然，不是某一階層，某一黨派單獨所能包辦，而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以外的全民族的義務和權利。因爲反帝反封建不是單純某一階層的要求，而是地主階層及其政治保鑣以外的革命民衆的共同的利害關係。在這兩重任務之下，團結了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大家的對象一致，所以能夠攜手合

作，或者上前綫衝鋒陷陣，或者在後方嚴守陣地。然而所謂「四階級的聯盟」，不是四階層對革命平分春色，卽彼此都出四分之一的力量，彼此又享受四分之一的權利。不是的，事實上永遠沒有這樣機械的事。各個參加到聯合戰線來的階層，都有個別的動機和立場。目標雖然只有一個，而動機和立場却各不相同，所以對於革命對象的堅決性，不免有許多不一致。他們之中，有的要求農業革命，有的却以農業革命爲革命的準備工作，有的對敵人動搖，有時喊出極左的口號，有時又喊出極右的口號，有的富於妥協性，革命一發展到你死我活的瞬間，就必然瑟縮不前或臨陣退縮。爲什麼有這樣的多樣性和不一致性呢？因爲各人的動機和立場不同的緣故。爲什麼立場和動機不同呢？是爲了各階層的經濟生活不同的緣故。歸根到底，又是一個經濟關係的問題。究竟那四個攜着手同盟的階層的經濟地位

是怎樣呢？同時，中國人中，除了那四個階層以外，還有地主豪紳軍閥等所代表封建勢力。爲什麼他們要變爲民族革命的敵人呢？爲什麼他們的利益，要和帝國主義融成一片呢？

這樣地追根問底，已達到讀者最初要尋問的地方了。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各個階層扮演着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客觀上各階層担負着一個什麼樣的任務呢？

執着三歲孩童問他要打倒什麼人，相信他也會說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爲什麼軍閥，或寬泛點說，封建勢力，要遭人打倒呢？當然不是因爲他們天生一副醜臉，封建階層中有許多是長得一表非凡的人。也不能說是他們的心術特別陰險，因爲他們做陰險的事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這不得已的苦衷在那裏呢？所謂封建勢力，裏面包括許多種人物，有買辦，

有地主，有商業高利貸，也有軍閥等等。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過程中，他們怎樣結成着利害關係？又怎樣爲外國資本盡忠效勞呢？。買辦是什麼？他們不是別的，乃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紀人。外資侵入中國唯一的目的，在於出賣商品，購買原料與投放資本，所以必須有一種中間人，買辦是根據這種要求產生的。因爲中國各地方的秤制和幣制不統一，商業習慣不一樣，而且在投資時，往往因國籍問題發生許多困難，如果不打消這種種不便，會減低中國的殖民地意義，因此買辦是不可缺少的一種人物。同時，也因有買辦的存在，列强在中國的經濟榨取網，必定一天天在推廣，而買辦的地位，也一天天在提高了，像這樣，他們當然是不可以分離的。然而列强不只要插足於通商口岸，或大城市，對擁有三萬萬人口以上購買力的內地，也是垂延三尺。於是他們就一心一德

利用中國固有的一切前資本主義的關係，達到他們征服中國農村的計劃。他們的榨取網是這樣佈置着：地主豪紳把由封建關係剝削得來的農產品，經過買辦，而運到洋行，再輸出於外國。通過這曲折的搾取關係以後，地主可以中飽，這樣就刺激了他們的封建慾，使他們有意或無意地盡了買辦的職能；所以農村的地主豪紳，城市的買辦，都是列强在中國的爪牙。帝國主義爲了鞏固自己的經濟關係，又必須加强政治的地位，在城市，在農村，用武力保護列强的經濟搾取網的是一切大大小小的軍閥：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帝國主義是「皮」、封建勢力是「毛」，帝國主義是「裏」，封建勢力是「表」，沒有皮，那有毛？沒有裏，那有表？要他們打倒帝國主義，要他們不爲革命的對象，那才是海外的奇談。